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古典术数文献 述论稿

赵 益◎著



中华书局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

赵 益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赵益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5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ISBN 7-101-04783-1

I. 古… II. 赵… III. 迷信术数-古籍-研究-
中国 IV. B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7904 号

-
- | | |
|-------|--|
| 书 名 | 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 |
| 丛 书 名 |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
| 著 者 | 赵 益 |
| 责任编辑 | 张文强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60 千字 |
| 印 数 | 1-2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783-1/I·647 |
| 定 价 | 18.00 元 |
-

绪 论

“术数”曾是中古以前(由唐末上溯)思想、知识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现代以来,随着反思古代历史的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古代术数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丰富的出土文献,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中古以前思想、知识发展过程的重新审视,促进了对古代术数更加深入的考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新材料催生的新方法如“二重证据法”,既有赖于对地下文献的发现与整理,亦有赖于对纸上遗文的深入考察和重新认识,二者既不可偏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传世文献的研究更是实践“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但在中古以前术数(本书称为“古典术数”)的传世文献方面,无论是前人的研究还是当代学者的重新考察,都还存在着许多缺陷。

中国学术本极重视文献的研究,就考镜源流一端而言,古今学人对中古以前两部具有学术史总结意义的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本书简称为“《汉志》”)及《隋书·经籍志》(本书简称为“《隋志》”),更有较深入的考察。《汉书·艺文志》考释之作,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以后,清钱大昕《汉书考异》、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王先谦《汉书补注》、姚

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刘光贲《前汉书艺文志注》及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杨树达《汉书窥管》等,并有精解。今人张舜徽、陈国庆又分别撰有《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予以总结辨证。《隋书·经籍志》之考证,则有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收罗宏富、考释精当,最称佳制(此前章宗源有《隋书经籍志考证》,然仅及史部);今人岑仲勉《隋书求是》,于《经籍志》之错漏,亦间有校订。当代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之《隋书经籍志考证》,重点作了技术性的整理,并颇具特色。此类文献辨证,当然也涉及作为当时精英学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术数”。但由于“术数”本身的性质,前人的研究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古代术数的客观性内涵、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宋以降,随着社会的发展、理性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正统儒学的确立,原本属于天道人事的技术性知识的“术数”,进一步淡出精英学术的核心范围而成为一个边缘化的补充。尽管其核心理念是提炼融合并仍在发挥影响,其方法也在民俗行为中有着持续的发展,但毕竟已经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宋以后主流学术崇道鄙术,斥“术数”为不经,本体现出观念的进步,但若因此忽视了阶段性的历史事实,将“术数”完全排除在中古以前思想、知识系统以外,则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当然是由前人的历史局限所致,我们对此不能苛求,但在继承前人文献研究成果时,必须保持对其局限的清醒认识。

二是对古代术数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时有误解。“术数”系统自秦汉定型以来,其内容之升降变化极其剧烈,《汉志》所载,《隋志》已十不存一;《隋志》所载,后世百不存一。这并非是出于外力的因素,而是其本身的知识内容的性质所决定的。“术数”以阴

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以易象数、历律之数为方法基础,而其知识的根本性质则为占卜、预言与祈禳,属于一种“技术性”知识,必然随着技术手段的革新而呈现出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旧有的技术因其不合实用而渐次消亡,如龟卜、占候望气、风角等。其次则是方法的革新促使新内容的出现,比如易占以钱代筮之后,其内容固已与旧有之易占迥然有别;而“式占”则在不断改变工具、推演模式及应用范围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的内容。因此从进化发展的眼光来看,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有判若霄壤者,有渊源暗伏者,绝不可一概而论。假如过分拘泥于推源溯流的观念,如谓《隋志》之易占必出于《汉志》之易占,《旧唐书·经籍志》(本书简称为“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本书简称为“新《唐志》”)之式法必等同于《隋志》之式法,必然会产生严重的谬误。

古人条叙学术,乃出于当时之认识,故而此种认识必然只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后世以机械观念去理解,势必发生错误,从而不能得到古代知识的历史客观事实。举例而言,清章学诚评《七略》“数术”曰:“数术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于叙录之后也。……至于天文、形法,则后世天文、地理之专门书也,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岂不整齐而有当乎?”(《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第十》)章氏之意,谓“阴阳”、“蓍龟”、“杂占”三类及“历谱”、“五行”,应以“器”之书而分别附于《易》、《春秋》、《尚书》“道”之书后,“天文”、“形法”则应以专门之书而自立门类。显然,这是一种以今概古的机械论观点。章学诚所不能体察的是:蓍法固见于《易》,殊不知《周易》原本就是

一部筮占之书；而后世术家固依《易》而创发新法，但“占卜”诸术仍与义理化哲学化的《易经》分道扬镳。阴阳、五行固然分别见于《易》、《书》，但此一观念渊源极早，《易》、《书》不过表述、运用而已，二者孰道孰器，在上古时代是无法遽分的。龟卜附《易》，历谱附《春秋》，即就源流而言，亦颇无据。至于以“天文”、“形法”为专书，则更显示出对古代学术实际的误解。当时“天文”，主要为星占，非仅今世之天文学；“形法”大部则为卜地相宅，更非后世之地理。刘向父子之《略》、班固之《志》的一些技术性疏误，并不影响其学术总结的客观性，而能否认识到这样一种客观性，完全取决于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态度。

总之，认识上的偏差，使前人关于中古以前术数文献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资料汇辑的水平上，尚未能达到一个整体反思的高度。

同时，今人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对古典术数的研究一般都建立在以传世文献记载去论证出土材料的逻辑顺序上，从而对古典术数的传世文献记录缺乏系统的分析与归纳（从文化史角度对术数的研究，不在此例）。除了实物资料外，近世出土的古典术数文献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马王堆帛书中的占候、占星、养生术及阴阳五行理论著作，二是秦汉竹简日书，三是敦煌遗书中的占卜类文献。无论是分而观之还是笼统以论，出土术数文献材料都无法涵括整个古典术数体系，它们都只能是某个时期某些门类的特定的幸存材料。另外，古代精英学术自有其发展过程，以《汉志》、《隋志》等为代表的学术总结和文献记录反映了精英学术对思想、知识的主观选择，传世记录以外的出土文献恰好证明了这种选择的存在。因此，持守以传世文献服务于出土文献的论证逻辑，必然会忽略了主要是代表着精英学术体系的传世文献的固有内涵和发展脉络。

严格而论,本书与其说是对古典术数文献的考察,毋宁说是一种对古典术数的文献目录学研究。因为中古以前术数文献本身差不多已沦亡殆尽,除了个别遗存典籍以及一些零散的称述以外,剩下的主要就是古典书志的总体记录,以《汉志》、《隋志》、两《唐志》为其典型。本书即主要依据此四种书志,结合前后相关记载,对中古以前的古典术数予以系统的论述。观念方面,力求突破前人的局限,弥补今人的不足。材料方面,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注意结合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方法上,则着重于在以下两点上的进一步拓展。

第一是分析。四种史志并无提要,《汉志》、《隋志》小序亦仅以总结源流大端为主,而诸志关于书名、作者、卷帙、存佚等著录,错舛疏误亦多。因此,细致分析尤为重要。这种分析除了征引材料予以疏证外,更重要的是必须采取统计、对勘、辨伪等一系列方法,以发现实质性的问题。

第二是比较。前人的比勘互证多侧重于类目的分合升降与书籍归类,对其他具体内容的比较则关注不多。实际上,古代书志的类目情况和具体归类只能反映比较大端的学术源流问题,而不能全面揭示学术内涵及其变化。因此,比较的对象不能仅仅局限在类目方面,而应该包括实际门类、具体数量、存佚情况、编排、卷数著录、题名著录和作者著录等全部因素。只有尽可能地对所有内容一一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照,才可能有所发明,提出新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实际情况的不同,本书四部分的撰作体例不尽一致。第一章采取疏证方式,重在拾遗补阙。第二章、第四章第一、二节以综论结合具体考辨为主。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则以问题为标目展开论证。凡于前人已有考释,详者略之,略者详

之,并以晚近相关研究以为补充,阙疑处则辨证诸说,参以己见。不敢自是,称曰述论之稿,实期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教,以作为今后对此课题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总 序

莫 砺 锋

南京大学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仅有一年,但是说到本中心的学术传统,却必须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斗转星移,如果把1914年9月由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立的国文预科班和国文专修科视为南大中文系的直接源头,那么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九十一个春秋了。去年在庆祝九十周年系庆时,我为了回顾系史而整理了一份曾在我系任教的已故著名学者的名单,发现他们中间曾经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竟占三分之二以上,例如:王伯沆、李审言、黄季刚、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吴瞿安、陈去病、顾实、汪东、姚永朴、陈匪石、卢冀野、胡翔东、闻一多、陈登恪、刘国钧、王易、罗根泽、朱东润、钱南扬、吴白匋、管雄、王气中、程千帆等。这些学者在南大任教的岁月或长或短,研究领域则各有专攻,但若论学风之朴实、学术之精湛,他们堪称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我系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久享盛名,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到八十年代以后又成为全国著名的重点学科。当然,像国内所有大学的中文系一样,南大中文系始终伴随着整个国

家的风雨历程,先后经历了抗战西迁、院系调整以及文革等曲折过程,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返正常的发展轨道。由于我系的前身之一是民国时代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又位于民国的首都南京,所以我们比国内其他著名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更多的艰难历程。抗战时期南京沦陷且遭到严重破坏,我系仓皇西迁,本来可以大展鸿图的发展前景化为泡影。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我系又受到有意无意的压抑和削弱,在国内的地位逐渐下降。此外,我系曾是以“学衡派”为标志的东南学术的重镇,由于学术思想领域内激进的左翼倾向渐占上风,而东南学风则被主流意识形态打上了“保守、落后”的烙印,我系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话语权日渐衰微。在上述过程中,古代文学学科所受到的打击是中文系所有学科中最为深重的。尤其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厚今薄古”的整体性学术氛围、“古为今用”的指导性研究思路,都使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动辄得咎。及至后来,在“大破四旧”、“儒法斗争”等喧嚣声中,整个古代文学学科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等到阴霾散尽、大地春回的时候,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雄风不再,而且甚为衰微了。正在此时,年过六旬的程千帆先生应聘到南大来任教,为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注入了生机。程先生曾在南大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求学,师从黄季刚、胡小石、刘国钧、胡翔冬、吴瞿安、汪辟疆等名师,还向当时在南大的另一个前身中央大学任教的汪东、王易等先生请益,不但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老师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正由于程先生的学术基础是在南大打下的,由他返回母校来领导重振古代文学学科的工作,在学术渊源上就与南大的传统天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程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总结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学术理念,由他来主持南大古代文

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条件形成较为鲜明的学科特色。于是,在程先生的主持下,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发展壮大,终于成为以成就卓著、特色鲜明而为学界瞩目的全国重点学科。

那么,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究竟有什么特色呢?简单地说,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文学与史学沟通。先说第一点:程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他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个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古今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长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有的甚至互相轻视。在学术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可说是当代第一人。幸运的是,与程先生一起领导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心领神会,程先生的观念成为整个学科的共同理念。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动手做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程先生撰写了四巨册的文献学教材《校雠广义》,还在古稀之年主持编纂《全清词》。周先生费几年之功完成《唐语林校证》,还专门撰写了长达五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卞先生长期从事清代、民国碑版的收集、整理,还编定郑板桥的全集。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从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二十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届又一届的同学们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

其次,南大古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不自设藩篱。古代中国的学术本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因为古代的学术文化本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也不宜只见一个侧面。程先生平生治学,虽然重点在文学,但也很重视史学,他在《史通》研究上花了那样多的心血,就是一个明证。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是文史兼通的。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中即收入了《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种著作,仅从书名就可知其性质是打通文史的。在卞先生的著作中,关于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评传显然都得力于其兼通文史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三位先生即使在研究古代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课题时也经常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例如程先生在研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时,就得益于对唐代科举制度等历史知识的熟练掌握,从而在资料的收集、甄别以及史实的考订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并得出了不同于前贤的新说。程先生的此项研究被认为是文史结合的典范性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又如周先生对曹魏集团“三世立贱”的现象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文史兼通,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精彩的论文来的。再如卞先生关于唐代传奇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一系列论著,别具手眼地将唐传奇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解析,从而使一些长期聚讼纷纭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凡此种种,都说明三位先生的学术研究均具有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性质。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学术路数,而且已有不俗的表现。

岁月不居,一个学科迟早会面临新老交接的问题。薪积火传,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代代相传的学术精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逐渐退出学科的日常工作,年轻的一代逐渐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由于学科的新一代成员大多是程先生他们的入室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以上述学术理念在学科内部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扬,尽管各人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路数并不相同,但是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证性研究的课题倾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十几年来,学科成员发表的论著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水平也许不算太高,但是基本上都做到了言之有物、立论有据,基本上避免了游谈无根或空洞无物的弊病。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中,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而心无旁骛。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学术必须创新,尤其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等方面,我们决不能因守师法而固步自封。近年来在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初步体现出开拓性的新气象。但是就原则性的学术精神而言,我们仍然坚守着本学科相沿已久的传统,我们坚信这是有利于本学科健康发展的优秀传统。

2004年1月,我们成立了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员都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成员,中心的物质条件也就是古代文学学科的原有图书、设备,此外一无所有。由于没有固定的办公用房,我们甚至没有悬挂中心的牌子。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呢?我们又为什么要以“中国诗学”作为中心的名称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想合在一起来回答。从表面上看,南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是在学校的要求下成立的,是为了适应现今的学术管理体制,也是为了进一步集中学科力量、凝炼学科方向的必要举措。从本质上看,诗学中心的成立确实能发扬本学科的传统,凸显本学科的特色,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本学科的优势。众所周知,程千

帆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泛,举凡校雠学、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堪称核心的领域,那就是诗学。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如《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等都是关于诗学的,此外他还编选了《古诗今选》、《宋诗精选》、《日本汉诗选评》等诗歌选本,这些诗选的选目和注释评析也都体现了程先生的诗学观点。同样,在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唐诗研究也是特别耀眼的一个闪光点。可以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诗学一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我们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泛指文艺理论的 Poetics,也不是专指做诗、论诗的学问,就像唐人郑谷所说的“衰迟自喜添诗学”或朱自清所说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鉴赏而言”。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诗学”也是广义的诗学,即一切有关“诗”的研究,包括对历代诗歌总集或别集的整理、编纂(例如重编《全唐五代诗》以及编纂《全宋词》)、诗人研究(例如诗人年谱、评传)、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近年来,我们还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域外汉文诗话的整理、古代诗歌的文化学研究等。我们当然并不认为“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也不认为“中国诗学”这个名称可以涵盖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部学术活动,但是我们确信本学科投入力量最多、创获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诗学”。所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虽然是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是其组成情况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基本重合,其学术渊源、学术路数以及学风倾向也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完全一致。

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内部,我们一向尊重每个成员自己的研

究兴趣,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高度体现个性的,同样,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一家之言。除了大型的古籍整理之外,我们从不奢望编写出大部头的集体著作,而情愿向学界奉献单篇的专题论文或篇幅不大的个人专著。诗学中心成立后,我们依然希望保持这种特色。诗学中心成立一年以来,中心成员完成了六部专著,它们是:莫砺锋的《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徐有富的《唐代妇女生活与诗》、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许结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程章灿的《赋学论丛》、赵益的《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现在我们把它们编为一辑,交中华书局出版。读者很容易发现,这六本书从内容到写法都并不完全一致,以至于我们很难按时下惯例,为它们起一个“某某丛书”的名称,所以名为《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这六本书算是专刊的第一辑。一年前,诗学中心是静悄悄地成立的,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发布消息。现在我们对诗学中心专刊的出版也不会作任何宣传,只希望把它们静悄悄地呈送到读者面前。作为诗学中心的主任,我有责任向读者介绍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此辑专刊的由来,是为序。

2005年2月2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汉志》数术略考释证补	1
第二章 《隋志》五行类研究	43
第一节 五行类部类分析	45
第二节 五行类术数知识体系述证	55
第三章 《汉志》数术略与《隋志》五行类之比较	128
第一节 汉隋二《志》所收书籍相当及在两个时代 地位相当、同样流行的术数种类	128
第二节 《汉志》收书数量多于《隋志》及在《汉志》 中位高于《隋志》的术数门类	134
第三节 《汉志》少《隋志》多及《汉志》无《隋志》新 出的术数书籍与类别	142